

[美] 李怀印 著
岁有生 王传奇 译

重构

重构 近代中国

中国历史写作中的
想象与真实



中华书局

重构

近代中国

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美] 李怀印 著

岁有生 王传奇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
(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013.12重印)

ISBN 978 - 7 - 101 - 09298 - 1

I. 重… II. ①李…②岁…③王… III. 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4299 号



书 名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

著 者 [美]李怀印

译 者 岁有生 王传奇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¼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300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298 - 1

定 价 55.00 元

前 言

本书作为一项有关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撰述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过去三十年间我自己在中国和美国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旅程。我在1980年代初进入历史本科专业，随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读硕士学位。现在回过头来看，80年代诚可谓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承前启后时期，其中既显露出空前的学术繁荣，又潜藏着整个学科的危机。那些经历了“文革”的历史学家，从否定极端政治化的历史写作着手，致力于各自领域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导致一时间各种专著和论文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研讨会的频繁举办，就重大历史问题展开热辩。但是，这种学术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在承袭自“文革”之前的一套分析工具、概念架构和解释方法的背景下出现的；换言之，人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受限于始自1950年代的同一种范式，尽管他们在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试图推陈出新，以服务于改革时期的现实需要。由于在阐释架构上并无突破，且跟

198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日益脱节，复苏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上失去了对公众和本专业新一代本科生、研究生的吸引力，结果出现所谓“史学危机”，跟毛泽东时代史学的独盛一时，适成对比。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相当多的时间花在读马恩原著上。当然，三年的研究生光阴，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各种学术问题和原始资料上；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为硕士论文题目的著名实业家张謇（1853—1926）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其中有关儒家价值观如何影响其企业经营和在南通一隅的通盘近代化计划方面的内容。不过，这样一个问题，很难让近代史所里尊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前辈们感兴趣，结果我的硕士论文，也只能用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张謇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他的政治态度，更具体地说，是关于张謇在经商过程中与封疆大吏们的私人关系和冲突，如何导致他在晚清变法、立宪运动中，从踌躇动摇到扮演领导角色。如此写就的枯燥论文，从未让我觉得满意。

我的反思，早在从研究生院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触发这一行动的，是在我无意之中，接触到新近出版的两本英文书，一本是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其中评析了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论，另一本是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书中将现代化理论系统应用于近现代中国研究（这两本书后来先后在1989年和1995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广为流传）。从此，我的兴趣点迅速转移到跟现代化理论和比较史研究相关的英文著述上，并在1986年11月号的《社会科学评论》上发表长篇文章，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最早介绍西方的中

国现代化研究的文字之一。1987年从研究生院毕业，随后六年，曾一度应北大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之邀，参与其主持的现代化比较史的课题研究，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架构下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终形成了一本合著《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我负责全书的导论以及1949年前的各章）。

1993年后，我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执教。在此期间，我的兴趣集中到19和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上面，所处的学术氛围也跟国内大相径庭。而这些年当中，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现代化范式（主要基于借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最终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流行，取代了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范式。近十年来年间，新一代学术异军突起，摒弃了既往的革命和现代化范式，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过去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把历史解释主要建立在外来的后现代批评理论和史学理论上面。曾经受过大洋两岸不同的学术训练，并置身于不同的史学传统之中，我在自己的乡村研究中，始终强调把长期历史趋势和全国性或区域性制度的宏观研究，与影响乡民日常行为的地方惯行和话语体系之缜密的微观研究，加以结合，以了解乡村生活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此一方法，体现于我的两本近作，即《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200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08年中华书局中文版）和《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2009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2010年法律出版社中文版）。及至2006年来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执教时，便已觉得，回顾20世纪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反思其中的不同写法和视角，对我来说是时候了。

本书按年代顺序检视民国以来迄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种种解释。由于此一领域史家众多，所涉及的题目纷繁庞杂，历史写作中所运用的方法又五花八门，这里自然不可能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丰富多样的史学文献作详尽的考察。因此，我在此项研究中所关注的，仅仅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s），支撑这些叙事的诠释架构，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为了深入了解对近代中国的多样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解释，我将聚焦于那些在本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若干史家，因为他们在建构和解构叙事方面，贡献最著；并将着重探究他们的学术背景、智识倾向，尤其是驱动他们从事历史写作的特定的政治情境。

但此书不止是一部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历史写作，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为各种势力政治竞争所需的意识形态制造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总会以自己独有的视角（或偏见）去解释过去，并且会进一步利用其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为现实的纲领作辩护，为今后的行动作指引。所以，深入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学之来龙去脉，亦为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所不可或缺。研究中国历史写作中不断变化的趋势，还会把光束投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思维中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传统之间的较量。过去的研究，往往强调1949年之前和之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流传和占据主导地位。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这只是其中一个侧面；另一个同样显著且更为重要的侧面，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在历史写作中所显示的坚韧和活力，及其在20世纪最后十年之最终胜出。所谓自由主义传统，这里指的主要是为知识分子所倾心的西式现代性和启蒙价值观，渗透于民国时期主流史家之著述中，并与他们的民族主

义立场交相辉映。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传统表面上让位于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尊崇，但事实上仍潜藏于资深学者对心智独立和专业自主性所持的坚守立场，并体现于19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以“历史主义”为掩护而对史学极端政治化所作的顽强抗拒。及至1980年代初，自由传统进一步在“新启蒙”的旗号下复苏，以否定毛时代的激进主义史学为其使命。到19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此一传统最终透过现代化范式之兴起，重新主导主流史家的中国近现代史著述。

除了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国内的近现代史研究之外，此项研究的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意图，是跟国内的学术界同行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不用说，研究近现代中国史以及中国史学史的学者，对于本领域自20世纪早期以来在研究方法、学术志趣以及解释方面的演进，都了如指掌，众多的专著和论文皆已出版。尽管如此，人们很少留意史学家的叙事建构如何型塑其历史表述，叙事又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些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抑或史家的主观想象。本书所考察的各个时期的几乎所有史家，都断言他们的表述真实可信，反映了实际发生的过去。在试图否定他们所要挑战的某个叙事时，他们的攻击目标，首先是叙事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思想假设；当中很少有人过问，对方是如何有意图地选择史实乃至虚构和想象某个“事件”来编织叙事的。在我看来，史家叙述过去的不同方式，在影响其表达方面，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同样重要。

我对今日中国史学研究的关注，还跟中国近现代史的诠释架构的重建问题有关。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史学危机”之后，中国的史学家在随后的二十年间目睹了历史著述的又一波兴旺景象，个中原因，多半在于市场经济的推动，使大量历史图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其中多是出于商业意图，以满

足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好奇心。与此同时，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家（主要是在后毛时期接受了史学训练）把自己从主宰以往历史写作的主叙事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其研究兴趣扩及曾被先前数代史学所边缘化或忽略的新领域和新课题。近年来，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大量党政机构文献的出版，也使研究者能够重建那些曾经被官方认可的史书所曲解或隐瞒的历史真相。所有这些进展，皆促成了近二十年众多题材的历史作品的繁荣。但是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史家仅仅满足于开拓新领域，以彰显个人的旨趣，或仅仅满足于发现新的证据，以揭示历史事件的真相。当中很少有人会去思考，他们的发现，对于重建历史阐释架构，以取代已被遗弃的旧的一套，究竟有何含义。无论如何，历史写作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由于它丰富了我们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改进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的方式本身。

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受到来自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和我执教的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多项研究资金的资助，从而能够赴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并有时间加以消化。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作为单个章节、会议论文或者期刊文章，跟同行进行过交流，获益于他们所提出了的具体、中肯的意见，这里尤其要感谢Kathryn Bernhardt, Jeremy Brown, Brian Fay, Roger Hart, Matthew Johnson, Margret Kuo, Stephen MacKinnon, 以及Michael Schoenhals诸人。我曾在2011年3月请Arif Dirlik到本校讲学，就相关问题深入切磋，这里特别要感谢他对此部书稿所作的评论，从中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Edward Q. Wang以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匿名审稿人就具体的理论和实证问题所提的详尽而富建设性的意见，使这部书稿得以最终成形。本书的若干章节，曾在我为本校研究生所开设的历次中国近现代史研讨班上进行过讨论。学生们

的反馈，推动了我对各章的修改。这里尤其要感谢David Conrad, Peter Hamilton, John Harney, James Hudson, 汪麟麟，以及王晓平诸位，跟他们的交流，印证了教学相长的说法。不用说，书中的所有观点和可能存在的谬误，皆由我负责。书中第三章和第七章的部分内容，曾经在*Modern China*（《近代中国》2010年5月第36卷第3期）和*History and Theory*（《历史与理论》2010年10月第49卷第3期）上发表过。在此感谢出版方允许将它们纳入本书。

最后，一如既往，我要借此表达我对妻子桂芸和儿女兆白、兆晴的感激之心。尤其是我们的两个孩子，不知不觉间，已从可爱的孩童长成了值得尊敬的年轻后生，各自即将进入高中和大学。充满关爱的挑战和家庭的温馨，伴随了过去数年间此书写作的整个过程。

李怀印

2011年5月19日

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中文版附记

本书的中文翻译，由岁有生和王传奇承担，我自己负责译稿的校阅、修改，以及部分引文的原文恢复。如仍有疏漏、辞义不明或为适应国内出版环境而改动之处，仍以英文原著为准，望读者鉴谅。

李怀印

2013年3月

目 录

前 言 1

中文版附记 1

第一章 导论 1

政治认同和历史表达 3

历史表述中的真实与虚构 8

1949年前的对立叙事 16

从学科化到激进化：毛泽东时代 20

从新启蒙到现代化：改革时代 25

在全球化时代重写历史 29

第二章 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 35

现代化话语 38

中国的现代化 47

历史和政治 63

1930年代的实用主义转向 73

第三章 革命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77

现代化抑或革命？ 78

走向毛泽东式史学 91

民族认同、国家建造与历史写作 108

第四章 制造新的正统：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 114

阶级斗争抑或主要矛盾？ 116

阶级斗争说的胜出 122

新正统所含的悖论 129

第五章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毛泽东时期的史学激进化 137

“史学革命” 139

捍卫历史主义 146

李秀成降清之争 157

“史学革命”的继续 163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之外 169

第六章 挑战革命正统：1980年代的“新启蒙”史学 176

挑战正统史学 178

卖国还是爱国：重新评估洋务运动 186

英雄还是愚昧：重新评估义和团 193

黎澍与新启蒙史学 199

1949年后的中国自由主义 207

第七章 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211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213

从近代化到现代化 221

在中国发现“现代性” 232

改革时期的乐观主义 242

第八章 危机中的主叙事 244

革命叙事的退却 245

超越主叙事 256

中国史学的“后现代转向”？ 261

探寻历史“真相” 264

第九章 结语 271

历史之作为实际与作为被建构的叙事 271

解构叙事 274

在时和开放的中国近代史 278

前瞻：全球化中的中国 283

注释 289

参考文献 302

第一章 导论

本书审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各个历史时期，通过建构不同的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诠释架构和叙事，来书写中国近现代史。¹更具体地说，本研究有三个目的。首先，它旨在显现中国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如何把本国的晚近历史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分阶段通往一个他们各自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进程，且赋予这些形形色色的近现代史解读以特殊涵义。我的分析的中心命题是，有关“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历史作品的演变，是人们对各自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关注焦点的一种回应；对他们而言，书写近现代中国主要是为国家现实的挑战和决策的合法化找寻历史依据，而不是在追求真理，或是去如实再现历史。因此，为理解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的表述，首先要将历史作者置入一种历史情境之中；他们对现实的洞察及其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会激励或束缚其描绘过去。换言之

之，历史作品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进程须臾不离，也与他们所拥护或详细阐明的、为其政治主张辩护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将历史作品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其所拥护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以此去审视20世纪初直至今日不断变动的中国近现代史诠释框架。这些意识形态涵盖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正统的、激进的或实用的毛主义，以及后毛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毛主义传统；它们无一例外影响着历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方法论和指导理念。

但是，历史描述的吊诡，不仅在于它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纠缠不清，从而使历史学家带着主观偏见去描述过去，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本身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且迄今尚未完成。因此，制约历史学家的，不但是他们著作中特有的空间感，亦即历史学家本身与塑造历史的社会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制约着历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有时间性，或者说是历史学家所置身的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特定的时间点。因此，史学家的作品，不但各有其特定的意图，是各自对历史的意义和秩序的主观理解，而且在本质上具有“暂时”性质，所反映的仅仅是历史学家本身所生活和描述的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历史进程的有限部分。在此时间点之后，是一个未知的未来——一个为当时的历史学家所无法体验和看穿的未来；日后历史的起起伏伏和变幻无常，一再打破历史学家们对各自所假设的历史过程的种种目的论预测。总之，在整个20世纪及其以后，这些空间和时间限制，直接带来近现代

中国历史表述的不断变化。因此，本文的另一目的，是系统梳理次第出现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主叙事，以及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后不一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解释；这里，我的主要关心，是欲确定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忠实地重构历史，抑或在多大程度上迁就其所孜孜以求的、想象中的历史轨迹，以服务其特定的政治议程。

在检视了各种诠释架构及主叙事的建构过程，并且讨论了20世纪初以来每个主要历史时期最具争议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到底是什么？是否有可能或有必要将“中国近现代史”理解（或设想）为一个有目的、有序、通往某个终点的不可避免的过程？或是将某个主叙事强加于中国新近的过去，并赋予中国历史之此一特定部分以统一的含义？就另一侧面而言，中国以及中国之外的历史家们，是否应该否认或忽视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和规则（如果有的话），不掺杂任何目的地书写历史？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放弃借由目的论叙事所支撑的大写的民族“历史”，满足于对孤立的个别事件和地方日常现象的微观研究，亦即小写历史，从而无可避免地将中国近几百年来历史变为一堆无序的、毫无意义的碎片？因此，本研究的终极关怀在于，是否有可能以一个真实的方式表述历史，同时在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使历史表述富含意义。

政治认同和历史表达

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一个自始至终困扰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貌似客观重构过去的学术旨趣与倾向于扭曲其表达的政